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年第3期 (总第39期)

徐进
杜哲元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

王铭

唐代东北亚国家的“华夷”观念复制

李少杰
赵可金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巴里·布赞
迈克尔·考克斯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刘鹏

缅甸的民主改革与美国的认可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Institut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政治科学

2014年第3期（总第39期）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 文正仁（延世大学）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
布 赞（Barry Buzan，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田中明彦（东京大学）
石之瑜（台湾大学）
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牛津大学）
托（William Tow，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张睿壮（南开大学）
沈丁立（复旦大学）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普林斯顿大学）
埃文斯（Paul Evan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贾庆国（北京大学）
猪口孝（日本中央大学）
萨 尼（Varun Sahni，尼赫鲁大学）
阎学通（清华大学）
彭佩尔（T. J. Pempl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编委会：

- 主 编：阎学通
副 主 编：陈 琪
执行主编：漆海霞
组稿编辑：孙学峰 刘 丰 徐 进 李 巍
评审编辑：周方银 马燕冰
-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313室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010-62798183 62786457

传 真：010-62773173

电子信箱：CJIP@mail.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2014 年. 第 3 期/阎学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97 - 6154 - 0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国际政治 - 丛刊 IV. ①D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408 号

国际政治科学 (2014 年第 3 期)

主 编 / 阎学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责任校对 / 程雷高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154 - 0

定 价 / 29.00 元

印 张 / 11

字 数 / 16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1 |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 | 徐 进 杜哲元 |
| 33 | 唐代东北亚国家的“华夷”观念复制 | 王 铭 |
| 86 |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 李少杰 赵可金 |
| 114 |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 巴里·布赞
迈克尔·考克斯 |
| 142 | 缅甸的民主改革与美国的认可 | 刘 鹏 |
-
- 166 注释体例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 中的思维定势

徐 进 杜哲元◎

【内容提要】 “思维定势”是指一些知识和观念通过扩散与积淀等机制作用于认识主体，使认识主体的内心产生与其相似或相符合的思维方式、认识内容和心理预期与偏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界出现了一些思维定势，包括“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这些思维定势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实质与趋势。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有了反思和讨论这些思维定势向何处去的必要。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界如何解读“二十八字方针”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解读“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之间的关系，将决定这些思维定势的生命力有多长。

【关键词】 思维定势 外交政策研究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二十八字方针

【作者简介】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电子信箱：xuj@cass.org.cn。

杜哲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dzy19910124@126.com。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政府自上而下和学界自下而上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思维定势 (thinking set),这些思维定势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目标、实质与趋势。然而,随着中国对外政策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这一关键外在条件的变化,这些思维定势是否还能准确反映并帮助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这就有了对此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必要。

本文认为,中国外交政策自 2010 年夏中日“扣船事件”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一调整持续三年多,止于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由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未来 5—10 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如下: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主席总结指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①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调整,甚至是吹响了外交全面改革的号角。在这个背景下审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 思维定势

所谓“思维定势” (thinking set),是指一些知识和观念通过扩散与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这次座谈会名为讨论周边外交工作,但从会议的规格和习主席讲话精神来看,它实际上是未来 5—10 年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定调会。

积淀等机制作用于认识主体，使认识主体的内心产生与其相似或相符合的思维^①方式、认识内容和心理预期与偏好。这种定势首先表现为原有的知识和观念成为一种稳定的模式和路线，其次这种定势还能够作用于认识主体对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与判断。就其表象而言，思维定势是一种状态，“是主体认识活动的一种准备状态，即把新的知识纳入旧有思路的待发状态。在这种待发状态下，一旦相关的刺激出现，主体就会把对刺激的认识活动拉入旧有的思路”。^②就其深层而言，思维定势是一种认知结构，该结构具有纵向和横向的普遍意义，即其存在于每个认识主体，贯穿于每个认识阶段。同时，这个结构中的知识与观念具有等级性，核心的知识与观念居于支配地位，而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则是这种认知结构产生作用的机制。

思维定势的形成机制是：一些知识和观念在其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社会化这个途径不断扩散、积淀，这些知识和观念在同化和普遍化中在一定时期内在人们的认知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成为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事物的惯性定律，“自然界的物体在运动中都有一种保持原来状态的惯性。物质在运动中所具有的惯性、定势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后，就要作为思维的一种定势表现出来”。^③其次，人类认识的发展机制就是对实践与客体的不断反映和总结。而这种机制显然具有时间上的继承性和积累性，因而使得人类的认识表现为阶段性的思维定势。再次，知识和观念的社会化更是一个重要的主动因素，人的一生总是处于社会的学习和交流之中。特别是现代国家以其强大的能力不断地向其成员注入有选择性的知识和观念，它们经过一定时间的传播与传承，不仅能够改变其成员的认知内容，而且还能够重塑其成员的认知结构，并最终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广泛的、同质化的思维定势。最后，人类语言在表达上的有限性也是思维定势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先验

① 付俊英：《论思维定势与创造性思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5期，第19页。

② 刘怀惠：《思维定势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第48页。

因素。

思维定势在其形成之后会具有如下特性：(1) 客观性和稳定性。思维定势是客观存在的，在其形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2) 模式性、自动性和倾向性。思维定势使认识主体形成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在受到刺激时总会自动做出选择与判断，这些选择与判断受制于认知框架中原有的知识和观念，同时还有着预定的倾向性。如冷战时期的 U-2 飞机事件，无论肯尼迪政府如何解释，赫鲁晓夫都认为这是美国针对苏联的一个战略性举动。(3) 封闭性和守旧性。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思维定势有其固有的边界，不同的或新的知识和观念难以进入。同时，作为认知相符机制的结果，思维定势天然倾向于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① 此外，思维定势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常见的思维定势有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等等”。^②

思维定势的作用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思维定势具有阶段上的正确性，它方便人们的认识活动，能提高认识活动的效率，有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共识，同时它还是新知识、新观念产生的重要条件和依据。就消极方面而言，思维定势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是普遍适用的，其模式性和自动性容易使其产生惰性，不利于其结构内部知识和观念的自我更新，从而使其自身显得愈加滞后。对过往知识和观念的过分依赖又使其在面对新事物和新条件时往往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此外，思维定势对新知识、新观念的吸收包容能力的缺失也往往使其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思维和观念的阻力，进而走向创新的对立面。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译者序，第14页。

② 程柏青：《谈思维定势的突破》，《教苑杂谈》2004年第10期，第53页。

二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主要有以下几种：“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面对当时中国外交的困难局面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在几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①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当时的中国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并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本文认为，“二十八字方针”堪称上述思维定势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根源，但是在新形势下，我们今后应当坚持、调整，还是弱化、放弃这些思维定势，值得思考。

（一）“韬晦”论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可谓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在2009年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这一方针微调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②“韬晦”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外交实务界和政策研究界均拥有大批的忠实拥趸。然而，近两年来，关于是否继续坚持和如何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原则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并形成了大致如下三种观点。

一是坚定支持派，以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为代表。吴建民历来主张中国应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①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于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6—7页。

^②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htm。

方针。2005 年 9 月 27 日,吴建民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有人提出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的政策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关系形势提出的,是大智慧的策略,中国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政策。”^① 2009 年 5 月 31 日,吴建民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崛起的道路很长,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刚刚开始,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至少还要管一百年。2014 年 1 月初,吴建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再次表示,坚持韬光养晦,可以使我们在实践中减少一些阻力。那些反对韬晦的人是弱国心态在作怪。弱国心态的表现首先就是始终认为自己国家比较弱小,怕被别人瞧不起,进而急于表现自己。^②

如果说吴建民大使是从一个资深外交官的角度来坚持和解读“韬晦”论的话,那么作为外交政策研究界的典型代表曲星所长的声音则显得更条理化 and 学理化。早在 2001 年曲星就撰文分析中国外交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必要性。他指出,“韬光养晦”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但仅从历史典故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显然又是不够的。理解韬光养晦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韬的是什么“光”,养的是什么“晦”,在于把握韬光养晦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可操作性。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邓小平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韬光养晦“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 1/5 的世界人口的实践来说话;“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别的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按计划实现“第一个翻番”,到 21 世纪中期,要基本上实现现代化。^③ 他认为,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仍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

① 《吴建民:中国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中新网,2005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9-27/8/631955.shtml>。

② 《吴建民:习主席提出的义利观很有针对性》,南都网,2014 年 1 月 2 日, http://paper.nandu.com/nis/201401/02/161329_2.html。

③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第 14 页。

有所作为”原则，理由在于“世界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没有得到纠正，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态势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中尽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但中国并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中国发展的机遇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当初中国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①

近十年之后，曲星继续坚持当初的观点。在2011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年会上，他再次指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八个字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光、晦、为。‘光’是意识形态之光，中国不要依据意识形态来决定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变，中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该国民众是否接受这些原则来决定外交政策，这叫作‘韬光’。‘晦’则是经济建设之晦。‘为’是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之为。从这三点来看，韬光养晦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再坚持韬光养晦就都有了答案。”^②

在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的讲话没有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是讲“奋发有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认为这表明中央已经放弃了八字方针。曲星反对这一观点，并认为“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并不矛盾，韬光养晦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③

二是调整发展派，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王缉思教授等人为代表。2011年王缉思教授撰文指出，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包括西方的不景气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同20年前相比，虽然我国的实力地位有了极为显著提升，国际压力却并不因此而减轻，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在国际挑战增加而不是减少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战略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仍然具有强烈

①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第16页。

② 《专家激辩“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不排除武力反击侵犯》，环球网，2011年12月17日，<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1-12/2273974.html>。

③ 曲星：《理念更新为中国外交注入新活力》，《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第27页。

的现实意义,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 20 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在对外工作中“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离开了“韬光养晦”的衬托,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①为此,王缉思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不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宣示,而将其精神更多地表述为“谦虚谨慎”(modest and prudent);二是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述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方向,具体而言,现实的国家战略目标不应该是超越美国,而是超越自己。^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王在邦研究员与王缉思的观点类似。王在邦指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始终遵循的哲学理念与政治韬略,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或存与废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坚持这一根本国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纳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论框架,以理性现实主义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墨守成规与急于求成两种极端倾向。要辩证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保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③

实际上,王缉思和王在邦都认为“韬晦”是本,是“有为”的基轴,“有为”不是为突破“韬晦”的框架。在“韬晦”与“有为”的关系问题上,军事科学院的罗援将军、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和本文作者持另外一种立场,即两者是一种平行关系。罗援指出,“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它必须和“有所作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叫作战略。比如我们军事上的积极防御战略,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字分开。而且,

①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 页。

②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第 9 页。

③ 王在邦:《论创造性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庆典特刊,第 48—52 页。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为我们维护国家和核心战略利益服务的，“韬光养晦”绝不等于我们要忘本。^①

时殷弘教授在2010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指出，“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韬光养晦”不能管一百年。中国外交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目前还是必需的，但是跟以前相比应该少一些。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②

本文作者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我们应把“韬晦”与“有为”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当成上位原则与下位原则的关系。今后中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要更积极地“有所作为”。虽然主客观因素都使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实力和面临的国际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放弃“韬光养晦”，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韬晦之举。^③

第三派是放弃派，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为代表。中国应当弘扬谦虚谨慎的战略文化而放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是阎学通教授近年来的一贯立场，但这一观点长期处于少数派地位。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后，阎学通认为这次会议以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标志着中央已经用“奋发有为”代替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他指出，“奋发有为”比“有所作为”更为进取。从语义上讲，“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是反义词，既无法并列也不可能有递进关系。从这

① 《专家激辩“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不排除武力反击侵犯》，环球网，2011年12月17日，<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1-12/2273974.html>。

② 《对韬光养晦要具体分析——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南风窗》2010年第22期，第35—36页。

③ 徐进：《在韬晦和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0页。

个意义来讲,这次会议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改变,就是强调“有为”。^①他认为:“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②

(二) “不结盟”论

“不结盟”是邓小平时代确定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它可以说是韬晦原则的合理延伸,即一个韬晦的国家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的确是一项外交创新,因为结盟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政治斗争的基本方式之一,邓小平时代之前的中国一直执行结盟政策,而且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国没有不执行结盟政策的。近 30 年来,不结盟政策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并被严格执行。中国官方通常将结盟与冷战思维相并列,作为其惯常的批评对象。比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声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该白皮书再次重申中国的不结盟立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③

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界,多年来不结盟政策的地位不可动摇,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坚定支持。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存刚教授从历史、现实和结盟后果来分析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必要性。他指出,“不结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无论是基于并不久远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抑或是对未来的基本预测,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推动结盟的实践则是不大可

① 阎学通:《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开始》,《世界知识》2013 年第 24 期,第 15 页。

②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网,2013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ceweeklly.cn/2013/1111/68562.shtml>。

③ 《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网,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26.html>。

能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或者极度简化的理论推演。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放弃了不结盟原则，某些结盟对象国也确有意向对此予以呼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加深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恶化而不是优化中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从而与结盟的主旨相背离。^①

外交学院的凌胜利博士从冷战后军事同盟的作用下降来分析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的不结盟源自对联盟不合时宜的认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谋求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的共同需要，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即军事同盟的效能下降、军事同盟无法应对多样化的安全威胁、基于威胁的同盟不再契合相互依赖时代的安全秩序要求。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主张通过新安全观获取安全，在多极化格局中构建无敌环境，进而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这既符合国家利益的需求，也是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的真正原因所在。^②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徐光裕从结盟的成本大于收益来分析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必要性。他分析指出，世界上没有无代价的结盟利益，它带来的弊病绝不可小视，特别是在平时时期，弱国、次国与强国结盟，往往会使它们如同小媳妇般处于不能自主的尴尬境地。当今世界上为何还有那么多国家追求独立自主走不结盟的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结盟能使自己的战略选项增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便于保持相对超脱的独立自主地位，可以左右逢源实施全方位外交，获取进退自如较为主动灵活的战略地位和外交空间，避免由于结盟而又产生意见分歧，造成无所适从甚至在无奈情势下出现不情愿地“被卷入”困局的被动后果。在目前的国际战略格局下，如果我们主动放弃不结盟，很可能“被称霸”“被出头”，我们的负担和要付出的代价必然增大。即便是大胆设想强强结盟，结果也

①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31页。

② 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9—30页。

多半是代价高昂, 事与愿违。^①

近年来, 不结盟政策开始遇到少数外交政策学者的批评, 至少在政策分析界它不可动摇的地位开始有些松动。批评者也分为两个阵营, 一部分人要求中国放松不结盟政策, 认为在国际形势和中国实力都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 我们不必僵硬地执行不结盟政策。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德刚副教授称中国应在结盟与伙伴关系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即“准结盟”政策。准联盟战略是指政治领导人运用次级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战略理念、机制和行为, 是联盟与中立之间的“灰色地带”。准联盟战略的好处是合作不冲突、树友不增敌。^② 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 中国应尝试开展“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③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也主张中国应以“准结盟”代替“不结盟”。他说, 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敌对行动, 中国如果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必然导致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战略围堵, 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必然进一步恶化, 甚至有可能出现针对中国的或者中国被迫卷入的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但是, 现在就公开打出“结盟”的大旗显然缺少可行性。我们应尽快谋划从“不结盟”走向“结盟”的战略性调整。^④

北京外国语大学尹继武副教授主张以政治和经济合作为主的“弱联盟”代替军事同盟式的“强联盟”。他指出, 在大国战争的危险已大大降低的国际背景下, 军事联盟的价值不能说完全丧失, 但我们不能寄望于“盟友”的援助, 而是要练好“内功”, 同时拓展联盟的内涵: 一方面将重点转向政治经济联盟, 另一方面积极由传统军事“强联盟”向后冷战

① 徐光裕:《放弃不结盟中国或“被称霸” 韬光养晦不过时》,《环球时报》2010年6月8日。

② 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55页。

③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57页。

④ 王海运:《如何破解美对我战略围堵 变“不结盟”为“准结盟”》,新华网,2012年3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11/c_122815157.htm。